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读刘岳兵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有感

白春岩

本书是《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研究丛书的第三卷,共七章,500余页。后附相关事项年表与参考文献。正文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是集分析解读近代中日关系、日本外交、思想以及社会文化于一体的研究力作。笔者不揣冒昧,将拜读后的心得与诸位分享。

就笔者管见,关于研究中国人之日本观的著作屡屡出现,如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①、熊达云的《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②但反之从史学角度研究日本人的中国观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颖的课题。尽管近年零星出现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但研究对象多侧重于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已经被反复研究的人物,对于其他思想家的研究并不多,分析也不够深入。针对这些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本书在分析论述时突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构成特点

首先,把研究范围设定在1840年到1895年。分析时以时间为主线(从幕末到维新、从“修好”交涉到出兵台湾、从侵台后的养精蓄锐再到甲午战争的一触即发),并在各个时间段对比了不同人物的思想。众所周知,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被动成为西方条约体系的一员。日本也在经历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造访”后被迫开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同为东亚国家的中日两国间,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而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本书研究对象的这50多年,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着变数和动荡的年代。

其次,在那个充满变数的“时势”中也造就了很多的“英雄”。在研究人物的设定上,本书不落窠臼,除了分析上述例举的代表性人物以外还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提到了佐藤信渊、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盐谷宕阴、高杉晋作、中村敬宇、德富苏峰、竹越与三郎、尾崎行雄等活跃于当时的人物,其中有一些不被中国学界所周知。作者通过分析这些人物的传记和著述等来剖析他们的思想。

另外,本书在论述中并非局限于思想层面研究,还兼顾了“从思想到行动”过程的把握。如第二章论述了各种不同的中国观是怎样被实证的,具体反映在鸦片战争后日本儒者及志士的中国观和1862年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等实际行动上。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天皇重新掌权并发

^① 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视察》,成文堂,1998年。

布了“凌驾万里波涛,振国威于海外”的敕谕。明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思想层面延续了幕末的中国观并调和了开国论和攘夷论两派的对立。具体行动上,产生了近代中日两国间签署的第一个对等条约(第三章)。为什么要签署这一条约?在日本史学界普遍采纳藤村道生的观点,藤村从日本方面先后提出的两个条约草案(1870年、1871年)中得出如下结论:外交政策发生了从力求与中国达成平等地位以取得解决朝鲜问题的优势,到力求与西欧列强为伍、企图在中国取得与其同样的侵略中国的特权(该书第117页,以下该书只标页码)。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如森田吉彦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森田认为:日本方面的意图不在于企求实现对清国的优越性,而在于追求加深对清国的友好关系(第117页)。对此,本书在剖析《清日修好条规》签订的缘由、对比分析外务省供职的官本小一郎与名仓信敦的不同意见以及政治家岩仓具视对外意识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赴清交涉”实质上是一个“作为‘经略’的修好”。然而面对日本有步骤的外交行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虽然对日本‘强悍之气’有所忧虑,但总体而言并未在意,对其力量估计不足。因为想要拉拢日本,所以对日本的动静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第215页)。这一鲜明的对比,无疑为其后的两国关系埋下了隐患。就在两国条约正式生效的第二年(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给清政府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日本的“无理取闹”最终得逞。其后日本出现了对清国“可侮”与“不可侮”的大讨论,最终这种蔑视中国的认识逐渐被普及,日本追求雄飞的愿望日渐迫切,而大清帝国的内忧外患也日益突出。由此,这场“出兵台湾以来,各种舆论上、战备上”(第315页)一直准备的行动,在朝鲜这个导火索的诱发下终于在1894年付诸实施,甲午战争爆发。

二、研究突破

笔者致力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特别是1871年中日两国间缔结的第一个对等条约——《清日修好条规》的研究。以下,对于本书的研究突破,笔者仅就与自己研究相关部分做一总结。

第一点,诸多研究将这一阶段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概括为“从崇拜到蔑视”。对其转变的动机,或认为是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或认为是“千岁丸”的1862年上海之行,或认为是明治维新的成功(第3页)。对此本书作者通过概括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中国观的类型(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特别是举出日本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的例子(第3—7页),分析后得出结论:各种主要对华观的类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经存在(第49页)。这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各种类型并非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变化而特立独现,而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第49、50页)。另外,各种中国观类型“也有共存与交错的现象,不同的中国观类型的形成又与当时日本的自我认识及西洋认识密不可分”(第50页)。由此可见本书突破了单向性、线性的历史分析方法,揭示了历史现象的重层性、多面性与复杂性。

第二点,对“玛也西”(Maria Luz)事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第171—182页)。此事件发生在1872年,在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主持下通过法律手段救助了将被卖去秘鲁的中国劳工。中国史学界对于此事件的研究屈指可数。特别在分析日本处理该事件的动机上,有论者认为“未发现日本政府在这起事件中对华抱有任何不良企图”,亦有论者认为日方的对华态度是积极友好的。本书作者通过征引外务省主持刊发的《白露国马厘亚老士船裁判略记》、《大日本外交文书》、《副岛大使适清概略》等第一手日文史料,特别是结合后面发生的历史事件,如1872年琉球使节觐见、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等,对“玛也西”事件重新进行评价,即“既要看到日本方面有对中国讲信修睦的友好的一面”,但“更不能无视日本方面企图利用此事件而设计的种种‘如意算盘’”。作者还特别指出,此事件的处理“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声誉,也为其处理台湾、琉球问题,赢得了谋划的时间,

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援’”(第182页)。这一结论把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起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洞察了历史事件的另一幕。

第三点,本书征引了大量史料,其中有些是没有被史学界重视的重要资料。前文提到,从史学角度研究此阶段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一个新颖而难做的课题。究其缘由其实不难理解,除了需要研究者缜密的分析考证之外,过硬的外语功底则是重中之重。特别是那一时期的日本史料,语法与现代日语不同,大部分书写使用草体,辨认更是困难。这无疑又给研究平添了诸多障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在论述时挖掘、引用了大量重要原始资料。如1871年来华议约随员石幡贞的《清国纪行桑蓬日乘》(第153—165页)、佐田白茅在《日清贯珍》中质疑出兵台湾名义正当性的理性发声等等(第226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在引用日本原始资料时将其翻译成汉语,这无疑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情并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史料依据。

三、几点看法

通过阅读本书,笔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另外,无论是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使笔者获益匪浅。最后,笔者想结合本书的论述补充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广大读者和作者。

首先,对于“玛也西”事件,本书看到了其在处理台湾、琉球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玛也西”事件发生在1872年,正是《清日修好条规》签订(1871年)与批准书交换后生效(1873年)之间的一年。虽然“玛也西”事件发生时,条规已经签订但其批准书尚未交换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为什么日本偏要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做这个很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为什么又要在“玛也西”事件发生后外务卿副岛种臣便着手赴清交换条规的批准书呢?从1873年副岛到清后受到的待遇可见一斑。1873年4月30日(同治十二年四月四日)条规批准书由中日双方代表李鸿章和副岛种臣顺利交换。这距离副岛到达天津仅有10天。不难看出其速度之快。交换当日,李鸿章热情招待了副岛一行。《教会新报》记载了当天的情景:

天津来信云,日本国与中国所换和约于四月初四日早晨在西山会馆换执,时有李中堂、天津地方官、并日本钦差及副钦差、并铁甲船上大员在座,当时李中堂备筵请宴,所备筵席因东洋人装束西国服色,故宴开又用西国器具,酒亦用西国美酒,据云中国所设西筵,未有如此之丰美者。^①

这可谓是空前的接待场面。李鸿章无疑对条规签订后的两国关系寄予厚望。另外在副岛一行到达之前,李鸿章曾上书总理衙门和同治帝,表明了希望条规批准书顺利交换的意愿。还特意在上书中提及了刚发生的“玛也西”事件。由此可见,此事件在《清日修好条规》顺利生效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再举一例,在日本出兵台湾(1874年)之际,日本派出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来华交涉。正值中秋节,恭亲王上书同治帝“日本国上年扣留叻国商船拐载华人一案,曾经南洋通商大臣派委员福勋,前赴日本带回,伊国款待甚优。此次该使臣大久保利通来华,系专为办理事件,与寻常驻京使臣不同”,并“两次致送食物”给大久保利通以表达友好。^②可见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刻,日本抛给中国

^① 林乐知等:《教会新报》(清末民初报刊丛编3),台北,京华书局1968年版,第247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31页。

的这一颗“甜枣”亦发挥着其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考虑中日关系时,不得不同时兼顾周边地区、国家的动向,如台湾地区、琉球、朝鲜以及欧美各国。本书中论及日本以琉球难民遭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在中法战争中密切关注两国战况和清政府对策;在朝鲜问题上不遗余力地蓄意发起争端,但在俄国问题上的论述不够充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政府内部,对于挑起甲午战争还有如下声音:“1882年参事院议官井上毅提出为防止俄国南侵,中日应合力保持朝鲜的独立。”^①1889年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也持有为避免俄国的威胁而使朝鲜中立化的构想。^②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不能单以“对外扩张”一词概括,应该对日本当时的国内外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当然笔者这么说并不是为日本对外扩张举动寻找推卸责任的托词,而是希望通过正视日本政府在具体步骤、方法上的分歧来更加全面地审视日本的对外扩张行动。

再次,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天平,总有其砝码偏向日本之感。即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后仿佛每一步都在有条不紊的计划中顺利实施。与之对比,大清帝国则是千疮百孔、四面受敌、内忧外患、处处不顺。是日本受到神的眷顾还是我们逆流而动呢?是中国缺乏识时势之人吗?查阅史料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时期认识日本的文章,如王韬在李鸿章任江苏巡抚(1862—1865年)期间曾上书李曰:“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拘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一岛国哉?”^③冯桂芬亦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日本蕞尔小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④另外,丁日昌、李鸿章等人也都对此时期的日本产生了警觉,但大清帝国为何每每受制于人?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不能不提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是处理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责任者和见证人。他的指令及对形势的判断对中日关系有重要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个没有人得李鸿章“法眼”的“蕞尔小国”,反而出了一系列意外的连环拳,打了大清一个措手不及还险些葬送了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尽管李鸿章在早期也对日本抱有警戒,幻想着通过缔结《清日修好条规》就可以使中日两国彼此相安,使朝鲜永获安全,但他没有正确估计日本的动机。在经历了日本出兵台湾和日本单方面在琉球的一系列举动后,李鸿章尽管提出了一些对策,特别是创建了北洋水师,但“裱糊匠”的这些举措并没有力挽“大厦”于将倾。

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处理国家关系时相互认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课题。正如本书作者所述,相互认识已成为“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纵观近代中日关系史,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给日本的警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大大超过了中国,警醒的日本发挥了“船小调头快”的优势,迅速改变了战略,积极学习西方的技术与先进制度。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用割地、赔款的教训给日本又当了一次“老师”后,便不得不受到来自昔日“学生”的欺压。俗话说:以史为鉴,追根溯源。这一时期的中日两国从“对等”到“对立”,其中夹杂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演变。设想在签订了《清日修好条规》之后,两国各自强国,互为唇齿。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但历史不能假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全貌以及历史演变,在处理当今乃至以后的中日关系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白春岩,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助手〕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芝原拓自猪飼隆明 池田正博『对外觀』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岩波書店、1988年、52—54頁。

② 井上寿一『山県有朋と明治国家』、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10年、70—79頁。

③ 王韬:《強國尺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81頁。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武昌经心精舍1898年重刊,第4—9頁。